



中国古代文学特征论

刘丽文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特征论

刘丽文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特征论/刘丽文著. -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6

ISBN 7-81004-798-1

I. 中… II. 刘…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5148 号

中国古代文学特征论

刘丽文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7 号

(邮编: 100024 电话: 65779405 或 65779140)

光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174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1004-798-1/G·448

定价: 12.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过程、机制、原理过程中，着重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思维模式、价值尺度等的作用，展示了这些无形的文化要素是怎样使一些主要文学样式排除具体的细节差异表现出某些确定性和趋同性的，以及具有这些特征的文学对中国文化起了怎样的作用。全书注意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得出结论，并从现象中抽取本质特征上升到理论。其中有关春秋赋诗言志的形成、《周礼》“六诗”的内涵、唐代叙事诗的类型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都为前人所罕言，极具启发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规律的发掘，在反思过去中，为今天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有益的借鉴。

目 录

总论	(1)
本书所论的中国古代文学特征及其文化意义	(1)
早期儒学与中国文学的类型与走向	(10)
一、儒学的基本精神、思维特点、渊源	(10)
二、早期儒学对文学类型与走向的影响	(15)
《诗经》政治化	(23)
周代《诗经》政治化的四种途径	(23)
一、采诗献诗——美刺政治，督导君上	(24)
二、礼仪用诗——固化宗法等级意识的乐教教义	(27)
三、赋诗言志——婉约含蓄的外交语言	(31)
四、引《诗》论事——《诗》是格言、法则和真理	(37)
春秋赋诗言志形成的原因、机制、原理	(42)
一、燕享礼仪中的乐章意义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原理	(42)
二、春秋时期礼仪用诗乐章之义的失落和赋诗言志的兴起	(55)
孔子《诗》说的形成及其内涵	(63)
一、孔子的《诗》“可以兴”	(64)
二、孔子的《诗》“可以观”	(67)

三、孔子的《诗》“可以群，可以怨”	(78)
《周礼》“六诗”之本义	
——《诗》是政治的教科书	(85)
一、“六诗”存在的语境	(85)
二、“六诗”释义	(93)
历史著作文学化	(103)
《左传》的史诗性	(105)
一、本节所使用的史诗概念	(105)
二、《左传》文体形态的史诗性	(108)
三、《左传》表现手法的史诗性	(111)
四、《左传》文本的史诗性整合	(115)
《史记》的写人艺术	(123)
一、塑造了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性格 复杂的人物形象	(123)
二、司马迁塑造人物的方法	(129)
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与 《史记》的人物塑造	(136)
《后汉书》的文学性	(140)
叙事诗歌三大类型化	(147)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三大类型	(147)
一、三类叙事诗溯源	(148)
二、乐府叙事诗系统	(153)
三、说唱叙事诗系统	(156)
四、言情叙事诗系统	(161)
五、唐以后三类叙事诗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165)
凸现民族气质的三类唐代叙事诗	(168)

一、实现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载体——乐府叙事诗 …	(168)
二、流露自我情感、饱含抒情气息的言情叙事诗 ………	(171)
三、体现民众审美情趣的变文叙事诗 ……………	(178)
四、唐代叙事诗铸就了后继叙事诗的表现模式 ………	(182)
戏剧晚熟及悲剧主题伦理道德化 ……………	(184)
中国戏剧晚熟的直接原因……………	(184)
一、戏剧的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 ………	(184)
二、对各要素的考察 ……………	(187)
三、叙事文学晚熟是戏剧晚熟的直接原因……………	(191)
中国古代悲剧主题的伦理道德化	
——兼论中西古典悲剧的差别 ……………	(195)
一、中西人生态度的价值取向、价值归宿	
及所铸造的人格特点……………	(196)
二、人生价值实现的前提——思维模式——艺术观	
——悲剧主题 ……………	(200)
三、人生态度——悲剧主题——悲剧人物……………	(203)
四、人生态度——悲剧主题——悲剧矛盾……………	(207)
五、人生态度——悲剧主题——悲剧结尾……………	(211)
六、结语……………	(213)
评析：爱情悲剧《娇红记》	
政治悲剧《精忠旗》……………	(215)
后记 ……………	(224)

总 论

本书所论的中国古代文学特征 及其文化意义

每一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为民族精神所铸就，体现了该民族的文化模式，并反过来充分地折射着民族精神。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Ruth·Benedict）认为：“一种文化，无论它多么微小，或多么原始，或多么巨大，多么复杂，都有一种模式，都是从人类潜能巨大弧圈中选择了某些特征，并以比任何个人毕生能做的一切更强大的力量给予了精心建构。”^① 文化人类学家C·克鲁克洪则进一步给模式下定义说：“模式的涵义就是给定系统中各单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由整体的普遍性所支配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所谓寻求模式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在一定的参照条件下，确定选择知识的标准、次序的标准和重点的标准。”即他认为，模式所指的是由文化基本结构决定的、排除具体细节差异的行为的确定性和趋同性。^②

文化模式是由“民族精神”（又称作“文化精神”或“民族气质”）决定的，^③ 什么是文化精神呢？博克（P. K. Bock）说：

① 《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9月版，序言。

② C·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③ “民族精神”、“文化精神”、“民族气质”三者都是从“ethos”译过来的。

“文化精神一词是由人类学阐释的，用以描述价值系统整合性的一般模式和方向。”^① 萨姆 (W. G. Sumner) 认为，文化精神就是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质的总和。^② 本尼迪克认为：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是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化的存在，“在文化内部赋予这多样化性格的，是每一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的，也是该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③ 总之，文化的民族精神“即指一个民族筛选文化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加上自己独自的形式和解释的心理态度。”^④

本书的研究目的有二：1、展示中国古代文学的某些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过程、机制、原理。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展示我们的祖先从人类潜能的巨大弧圈中选择了哪些特征并以怎样的次序和标准建构我们的文学，并融入民族文化总体模式之中的。2、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国古代文学体现了怎样的民族精神，并对中国文化起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民族文学特征从不同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概括。本书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学特征主要是就笔者多年研究体会较深者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 一、《诗经》政治化；
- 二、历史著作文学化；
- 三、叙事诗歌三大类型化；
- 四、戏剧晚熟及悲剧主题伦理道德化。

《诗经》政治化并不是新鲜的命题。所以本书所做的工作就

① 博克《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② 《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③ 庄锡昌等编著《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④ 同上。转引自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3月版第6页。

不应该是描述，而是通过最充分地利用先秦时期所留存资料，进一步考察《诗经》政治化的来龙去脉、机制、原理、全部过程等，以见民族精神是主要以何种文化要素、怎样对原本属于“文学”的《诗经》以自己独自的形式进行解释、以及解释时的心理态度。

笔者以为，《诗经》中的诗一开始就不是作为文学而是作为政治工具而被采撷和集中的。它在周代主要有四种用途：a、美刺政治，督导君上；b、用于礼仪，固化宗法等级意识；c、赋诗言志，以诗代言，用于外交；d、作为格言、法则，加强论辩的说服力。在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最能体现春秋贵族儒雅风度的赋诗言志产生的机制和原理是：春秋时期天子衰微、诸侯力征的社会变化，使礼仪中的乐章失去了被宗法化、等级化的社会思维场，乐章之义失落了。原有的燕享用乐已不适合新的情况，在没有更适用的燕享用乐出现之前，“点歌”并以诗代言——赋诗言志便应运而生了。因这种特殊的对话方式具有良好的效果，故而其他场合有时也被应用。以“兴”、“观”、“群”、“怨”为主要内容的孔子《诗》说，是春秋时期特定的社会思维场的产物。它的内涵只有放在春秋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被正确和充分理解。以此为据可知，孔子的“《诗》可以兴”是从西周礼仪用诗、春秋引诗论事以及赋诗言志等三种用《诗》实践中概括出来的、集《诗》的功能、用《诗》的思维方式、用诗目的为一体的《诗经》阐释学和《诗经》应用学概念。即从功能角度言，它的认为诗能启发人的思维，唤起人的联想，把诗看成一个多义的、可根据阅读者自身理解进行再诠释的、从而发掘出深刻思想的文本；在思维方式上，它是取象类比思维或顿悟思维；在用诗目的上，以“兴”解诗最终落实到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教化上。“《诗》可以

观”不止是“观风俗之盛衰”和“考见得失”，^①更包括观人的道德、志向、情感、前途、未来；观一国的外交意向、目的、心理、决策；观执政者的才干、素质、精神面貌乃至国家的前途；还可以观“礼”——以《诗经》中所含纳的丰富的礼的内容和礼的精神为依据，找回因礼崩乐坏而失落的某些礼仪细节。“《诗》可以群”主要是就《诗》的乐章之义和赋诗言志而言，前者作用是指固化人的宗法等级意识，后者主要是指消弭矛盾。“《诗》可以怨”，则既是指在初创时诗本意的功能，也是指春秋时《诗》在应用中被再诠释时的功能。就再诠释时的功能看，乃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周礼》“六诗”，则说明《诗经》是贵族学子的政治教科书——“风”是指教学生学习乐理乐义；赋是指教学生用一定的吟唱方式认记歌词；比是指教学生用诗歌的词义讽谕美刺政治和引诗论事；“兴”是指教学生学习用乐章之义引导、启发思想，修养身心，培养宗法意识；“雅”和“颂”分别是指教学生专门学习朝廷燕享等正乐和祭祀中的乐章。六者的顺序体现了学习由浅入深、由基础到专业、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渗透着西周政治的伦理教化意识和乐教原则。

笔者认为，《诗经》政治化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教化意识。这种政治意识和教化意识以宗法伦理道德为最高理想和价值标准，以追求社会和谐稳定为最终目的，以比兴思维和直觉顿悟的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也体现了含蓄委婉、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本书《诗经政治化》一章的论述，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历史早期民族基本精神的形成及其对文化要素的筛选过程。

《诗经》中诗歌的产生年代和被广为应用于政治的时代，几

^① 前者出自《论语注疏》卷十七，后者出自《论语集注》卷九。

乎都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轴心期,^① 所以,《诗经》政治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在奠定了《诗经》经典化、神圣化地位的同时,诠释的内容甚至方式与《诗经》本身一起,共同在规范中华民族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甚至中华文化的大方向上都产生了巨大作用。因此,本书对于它的论述格外详细。

同样发生在民族文化早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特征是历史著作文学化(严格说来,它本不应算文学特征而是史学特征)。这

① 《诗经》所收诗是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6 世纪作品;引诗论事、赋诗言志以春秋中期、后期为兴盛。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曾提出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他将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这一历史时期称作“轴心时代”。他说:这一历史时期充满了不平常事件,“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到诡辩派、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的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从此,“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所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见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 页。)

雅氏所说的轴心期理论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瞩目。笔者认为,雅氏所说的轴心期即是民族基本精神系统的奠基期,它奠定了民族文化的基本框架及民族的基本精神气质。一般说来,最能体现民族基本精神的往往是在后代被奉为圣典的若干部著作:如波斯的《古圣书》,希腊的《荷马史诗》,希伯来的《圣经》等。而在中国则是《易》、《诗》、《书》、《礼》、《春秋》以及《老子》、《庄子》等等。就中国文化讲,“六经”及《老子》、《庄子》等,确如雅氏所说,它们所产生的思考和所创造的一切,始终照耀着未来的历史。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部分,就是对这些典籍、主要是“六经”的诠释中体现的。“我注六经”也好,“六经注我”也好,总之,轴心时代所留下的这些典籍以及对这些典籍的发掘、阐扬,一直规范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至今仍可见到其影响。

里所说的历史著作文学化，主要是就先秦两汉的正史而言。其表现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以文学甚至小说的手法叙述历史，描写人物。这一特点在先秦以《左传》为杰出代表，汉代司马迁秉承其传统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史记》达到了甚至可与古代优秀小说媲美的历史著作文学化的顶峰。笔者认为，中国历史文学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历史发展的早期，文史哲等形态混沌未分，人们对何者为文学何者为历史没有明确的区分意识，在最先独立出来的政治意识和史学意识作用下，神话被历史化、政治化了，史官文化消解了神话的怪诞色彩，却保留了神话的“艺术”思维方式，视古已有之的、神话式的记录远古历史的手段为天经地义的正宗写史方法。本书以《左传》、《史记》、《后汉书》为例，展示了历史著作文学化的巨大成就。而它的文化意义或说文学史意义，则主要是在文学自觉甚至叙事文学意识自觉之后才在叙事诗、小说、戏剧中充分显示出来。当然，这种显示是比较曲折的，已融入了《诗经》所奠定的政治意识和教化意识。

与前述的两种文学特征相比，叙事诗歌三大类型化和戏剧成熟及悲剧主题的伦理道德化特征出现的时代较晚。它们特征的形成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与前两个文学特征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达比较晚，虽然《诗经》当中已有了一些叙事诗的雏形，汉乐府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中出现了叙事诗，有的甚至达到相当高水平，如《陌上桑》等；文人也有个别模仿之作，如辛延年的《羽林郎》等，不过到魏晋南北朝，无论是民间还是文人创作，又多转向了抒情。但到了唐代，随着抒情诗的空前繁荣，叙事诗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并显示出界限分明的三大类：乐府类、说唱类、文人类。

乐府类叙事诗指的是以反映民生疾苦和讽喻时事为主要内容的叙事诗，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人生态度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兼济天下、献身王政、立功立德；凝聚着他们的社会理想：圣君

贤相、国泰民安；贯穿着他们君国民三位一体的思维方式：“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作者的动机是“补天”，试图在既定的社会规范下，顺应社会群体意识，揭露社会弊端，修补国家机器，重新调整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求得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乐府类叙事诗强调诗的政治功能而忽略它的艺术特质：重视取材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在写法上具有很强的政论色彩，重在强调传达某种政治观念，不追求事件的完整、情节的感人和人物形象的鲜明，艺术上往往具有散文化倾向。它把诗当成实现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载体，完整地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是其中的代表。

说唱类叙事诗指的是民间说唱文学中以诗歌形态出现的叙事诗。它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汉以前；汉及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汉以前为说唱叙事诗的萌芽期，当时的所谓说唱叙事诗，只不过是人们在人们口头流传的具有叙事性的篇幅不长的诗歌，它并未被人们有意识地创作，也没有被当做一种专门的娱乐活动，更没有产生脱离劳动专靠讲故事谋生的民间艺人。两汉魏晋南北朝是说唱叙事文学的初起期。据出土的汉代说书俑看，汉代已经有了说唱艺人，但由于史料缺乏，汉代说唱艺术详情还不可知。从四言诗已经衰落五言诗正处于酝酿及形成阶段的状况判断，汉代还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叙事诗，因为还没有成熟的、可资凭借的诗歌表达形式。东汉末年，五言诗成熟了，魏晋之后，文学也彻底自觉化了，但从现存叙事诗看，它基本上还没有脱离事实的藩篱，这样无疑会限制大规模的叙事诗的产生。唐五代是说唱叙事诗的正式形成期，事实上纯粹意义上的说唱叙事诗从这时才开始留下文献资料——《敦煌变文集》中《捉季布传文》等几篇。这几篇艺术水平高下不一，说明了说唱叙事诗从正式形成到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宋金元明清是说唱叙事诗的繁荣

期。这一时期说唱叙事诗以各种名称在民间流传，如诸宫调、弹词、鼓词、宝卷、子弟书等。说唱叙事诗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叙事生动，故事完整。其中长者，甚至洋洋万言或几十万言。内容上也往往各有专属，如弹词多写爱情故事，鼓词多叙战斗生活。而就题材说，讲史则十分发达。说唱叙事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结构故事塑造人物时的审美理想和思维模式：浓重的历史意识、类型化的人物形象、对圆满结局的追求。

言情叙事诗是指白居易的《长恨歌》、刘禹锡的《泰娘歌》之类的写男女艳情、艺人遭际、宫闱传闻等与上层社会和个人私生活联系较多的诗歌。这类诗主要袒露的是作者政治生活中公开展示的人格面具之外的情感。尽管在诗中作者的忧患意识仍隐然可见，但它大都是没有或少有外在功利目的的内心情感意绪的流露，甚至是萌动于深层意识的对官能乐感的追求。在形式上，它们或以七言歌行、五言古诗和五言排律形式，或以多首律诗、绝句的组诗形式叙述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艺术上，它淡化情节，少凭借流动叙述而多诉诸于静态的形象画面。它往往舍弃复杂事件，保留有代表性的、易于抒情的细节来表示人物的某种经历，然后通过这些图景的转换，显示时间的流动，推动情节的完成。中间略去的地方，靠读者想象去补充。它不展示矛盾冲突，也不着意刻画人物性格，只写人的大致经历和最终命运。这类叙事诗主要表现了作者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和中华民族讲究韵味意境的美学追求。言情叙事诗在唐代勃然兴起后，宋金元明不绝如缕，到清代又蔚为大观，出现了《圆圆曲》等一批诗作。

在中国文学史上，戏剧是最晚熟的文学样式。本书认为，中国戏剧晚熟的直接原因是叙事文学晚熟，终极原因是神话的历史化、政治化、伦理化。早期儒学过早地把神话与安邦治国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许多生动怪诞的神话被理性化纳入道德治国界域，化为古史或古史人物，使中国未能形成古希腊那样的复杂的体系

神话。因此，中国没有古希腊那样长篇巨制的民族史诗，这使中国叙事文学先天养料不足——这种先天养料，既指创造复杂叙事文学所需的资料、素材，也指创作方法、技巧方面的艺术积累，更指由具有异常稳定性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形成的固定的心理范式。直到唐宋，与戏剧在审美指向上有一致性、在审美形态上有同态性、在审美效应上有同构性的纯粹的叙事文学（指复杂叙事诗或小说）成熟之后，戏剧才以成熟的姿态，大规模地登上历史舞台。笔者认为，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戏剧题材是古典悲剧。古典悲剧多以伦理道德问题为主题、以教化为目的；主人公身份多处相对附属地位，道德完美，性格单一、类型化；悲剧结局往往给人以一线光明。古典悲剧的这种固定的模式，与中国古代文人以封建伦常为价值取向，以修炼完美道德、锤炼符合封建伦理规范的人格为价值归宿的人生价值观有密切关系；更直接受制于戏剧的价值观。而所有这些，又都与《诗经》的政治化、历史的文学化体现了相似乃至共同的思维和精神。

总之，本书对中国文学特征进行研讨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文学。在这些特征中，我们看到了那些“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和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①的无形的文化要素——基本人生态度、思维模式、价值尺度等，即民族精神对文学的模塑；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主要样式是怎样在文化基本结构的框架下，排除具体的细节差异，而表现出确定性和趋同性的。它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规律的发掘，在反思过去中，为今天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教训。

① 丹纳《艺术哲学》。

早期儒学与中国文学的类型与走向

中国文学特征的形成，原因很多，但笔者以为与早期儒学的影响有很深的关系。这种关系要追溯到儒学的基本精神等问题，下面就作一简要阐述。

一、儒学的基本精神、思维特点、渊源

（一）儒学的基本精神

笔者认为，儒学的基本精神有三：

1、具有对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与参与意识，把立德立功作为人生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归宿。这一人生观一以贯之地存在于绵延二千年的儒家学派之中。以早期儒学论，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① 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② 已成为古代儒学信奉者的座右铭。从行为上看，儒学创始人孔子及“亚圣”孟子，都曾为拯救天下、建立理想社会而奔走呼号。他们一方面游说统治者，希望得到任用以推行自己的学说，济天下利万民，努力把理论付诸实践——“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③ “待贾而沽”；^④ 另一方面，在立志进取不被所用情况下，退以立言，

① 《论语·泰伯》。

② 《孟子·尽心上》。

③ 《论语·阳货》。

④ 其义见《论语·子罕》。